

史海探源

巴黎通信社始末*

陈玉申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江苏南京 210093)

【关键词】法国; 巴黎通信社; 巴黎和会; 五四运动; 勤工俭学

【摘要】论文对巴黎通信社的创立及其运作情况进行了考述。巴黎通信社适逢1919年巴黎和会的召开应运而生。它最先发回了中国代表团在山东问题上交涉失败的消息, 成为引发五四运动的源头之一。巴黎和会结束后, 它继续向国内媒体供稿, 注重介绍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和苏俄现状, 对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也作了持续的报道。少年中国学会曾计划在巴黎通信社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国际通讯网, 但因条件不足而未能实现。

【中图分类号】G21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162(2012)03-0044-07

Paris News Agency

CHEN Yu-shen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Key words: Paris News Agency; Paris Peace Conference; the May 4th Movement; work-study program

Abstract: In coincidence with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 the Paris News Agency was launched by some members of the Young China Association who came to study in France in early 1919. This new agency was the one that first dispatched to China the infuriating news that the Chinese delegation's efforts to reclaim China's sovereignty over Shandong province were thwarted by the powers at the conference, which became one of the fuses that invoked the May 4th Movement. After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 it continued to furnish international news with prominent attention paid to the Socialist movement in Europe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to China's domestic media. It also continued to report on the Chinese students' work-study program in France. The Young China Association once planned to establish an international media network on the basis of Paris News Agency, but it was not realized due to uncondusive circumstances.

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 肇因于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巴黎和会召开期间, 中国留法学生创办了巴黎通信社, 向国内报纸发稿, 及时传会和会讯息。当和会决定不将青岛归还中国

【收稿日期】2012-03-08; 【修回日期】2012-06-30

【作者简介】陈玉申(1961—), 男,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新闻传播史。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近代新闻通讯社发展史”(10BXW001)阶段性成果。

时，巴黎通讯社率先将这一消息电告京沪报馆，成为引发五四运动的源头之一。仅凭此点，巴黎通讯社在海外华人传媒史上即占有重要地位。然而，由于资料甚为零散，不易查考，学术界对于巴黎通讯社尚缺乏充分的研究。有些论著虽然谈及巴黎通讯社的新闻报道活动，但大多语焉不详，鲜有具体、深入的考察。^①有鉴于此，笔者稽索相关史料，对巴黎通讯社的经纬始末作一考述。

一、巴黎通讯社的创设

中国近代报纸的国际新闻，主要依靠外国通讯社供稿。这些通讯社都有一定的背景与立场，其新闻报道往往以本国利益为前提，常含有宣传煽惑作用。但中国报馆因经济力量薄弱，一般无力在外国派驻专任记者。为了开辟自己的新闻来源，一些报馆在海外留学生中选聘通讯员，通过他们获取一部分国际讯息。鉴于报界的广泛需求，有的留学生在海外创办新闻通讯社，有组织地为国内报纸供应稿件。如1915年中日交涉“二十一条”时，在日本留学的邵飘萍、潘公弼创办了东京通信社，向国内报道日方动态。1918年，曾琦、张梦九等留日学生在东京组织华瀛通信社，为国内报纸采写日本通讯，揭发日本的侵华阴谋。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协约国集团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讨论战后问题。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希望以战胜国的身份，在巴黎和会上收回山东权益，并取消列强在华的一切特权，改变半殖民地的国际地位。巴黎和会与中国关系甚巨，成为国内舆论关注的中心，人们都翘首期盼着巴黎的消息。在这种形势下，留法学生遂有创办巴黎通讯社之举。

巴黎通讯社（Agence d'Information à Paris）^②成立于1919年3月，创办人是李璜和周太玄。关于巴黎通讯社在法成立的经过，李璜日后有如下的回忆：

当我一九一九年二月五日到了法国，正是巴黎凡尔赛和会开幕刚及半月，因为它与我国收回山东权益以及国人希望藉之取消不平等条约关系很大，本于爱国之情，我便大为分心，不常去听课，而反去专心于凡尔赛和会的情形，每日读巴黎各大报甚勤。适凡尔赛和会开到三月底间，周太玄兄自上海来到巴黎，言京沪各报纸需要巴黎和会内幕消息甚急。他来的时候，慕韩嘱他为上海《新闻报》与《申报》长期通信，愿按月酬报通讯稿费。王光祈来信也称北京各报需要和会消息。太玄本是穷学生，此次敢于冒险前来，就要靠此事以维持留学生生活。但太玄的法文程度太有限，无法读报，因之要求我读报译与他听，他录下来，加以编纂，用油印印出数份，寄与京沪各报，大受欢迎。于是我与太玄两人所办之“巴黎通讯社”，每周发稿一次，特别注重巴黎和会的一切动态，因之便成为引起是年国内五四运动的发生源头之一。^[1]

李璜、周太玄以及上述回忆中提到的曾琦（慕韩）和王光祈，都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主要成员。巴黎通讯社的创设与少年中国学会有着直接的关系。少年中国学会发起于1918年6月，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因此，学会成立之后，首要之务是从事社会活动，以为救国建国之根本。社会活动的范围甚广，新闻事业亦为其中之一。学会的主要发起人和组织者，大多有从事新闻工作的经历：王光祈是《京华日报》的编辑和《川报》的特约通讯员；周太玄曾经在《民信日报》、《中华新报》和中华通信社做编辑；李大钊先后担任《晨钟报》主编、《甲寅日刊》编辑和《新青年》编委；曾琦在东京发起组织华瀛通信社，回国后又创办了《救国日报》。他们对新闻事业都有浓厚的兴趣，创办报刊和通讯社乃成为学会着力

① 相关论著主要有：陈里特：《欧洲华侨生活》，海外月刊社，1933年；李明欢：《欧洲华侨华人史》，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鲜于浩：《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史稿》，巴蜀书社，1994年；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金光耀、王建朗：《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2006年；陈正茂：《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少年中国学会史》，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

② 巴黎通讯社的法文名称见于1919年10月22日《时事新报》所载《最近赴法者之情形》文后附录《法国华侨社各团体启事》。

拓展的要务。1919年初，因部分会员赴法国留学，举世瞩目的凡尔赛和会又在巴黎召开，学会便决定把新闻通讯活动的重点放在巴黎。巴黎通信社的另一创办人周太玄回忆道：

由于1919年初欧亚的交通已经恢复，“少中”会员纷纷赴法、德留学，并从事一些国际社会活动。……同时巴黎和会将于5月在巴黎召开（按：日期有误，应为1月18日召开），全国人民都希望通过这次和会能阻止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尤其切盼能收回由日本占领的青岛胶州湾。在这种蓬勃的形势和热烈的愿望之下，“少中”的发起人和一部分会员在京沪讨论会务时便自然地重点放在巴黎，决定要配合这一形势展开具体活动，发挥奋斗实践的精神。当时确定把重心放在通讯组织和联络工作上。原来想同时在日本东京设“华瀛通信社”，在美国设“纽约通信社”，巴黎设“巴黎通信社”，但因日、美两地会员既

然不多而形势要求又不如巴黎的有利和紧迫，所以便决定把力量都投在这方面。^[2]

由周太玄的这段回忆可知，少年中国学会原计划在东京、纽约和巴黎同时成立通讯社，建立一个国际通讯社，唯因人力及情势的演变，才决定把力量投在巴黎，先成立巴黎通信社。周太玄还回忆说，巴黎通信社的一切具体办法和准备工作，他在赴法船中即先拟好。在赴法途中和到了巴黎，得到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倡导者李石曾、吴玉章的支持。与周太玄同船赴法的有代表广东军政府参加巴黎和会的伍朝枢和为中国代表团担任联络、翻译工作的郑毓秀，他们两人对巴黎通信社的创办也提供了帮助。

周太玄抵达巴黎后，很快与李璜办起了通信社，3月底便开始向国内报馆发稿。国内报纸关于欧洲新闻的报道，向来为外国通讯社所垄断，所以都热烈希望能有自己的通讯社供稿，更加以少年中国学会负责人预先的宣传联络，所以巴黎通信社一开始供稿，京沪各大报便竞相采用。在北京的管穹来信说：“巴黎通信社稿国内甚为欢迎，北京《晨报》、《国民公报》，上海《时事新报》、《中华新报》、《民国日报》、《神州日报》都已登载。”^[3]可见通信社成立之初，便拥有不少订户，形成了相当广泛的影响。

二、对巴黎和会的报道

如上所述，巴黎通信社乃因巴黎和会的召开而应运诞生。通信社成立后，李璜和周太玄立即展开对巴黎和会的报道，及时向国内报纸提供和会的最新动态。他们编发的新闻，首先取材于当地的报纸。当时巴黎的大报，每天都三次出报，晨五时版、八时版与正午版，头版重要消息都各不同，对和会的报道尤为迅速。这些报纸，为巴黎通信社提供了丰富的新闻来源。为了对和会作更直接、更深入的报道，李璜和周太玄也到和会上亲自采访。和会召开期间，各国记者云集巴黎，据前来采访的《大公报》总编辑胡政之统计，“各国报界为平和大会事来法者，美有二百数十人，英有二百人，意有百数十人，日本有三十余人。”^[4]李璜、周太玄与胡政之等人作为中国记者也加入到这支采访“大军”之中。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胡政之是采访巴黎和会的惟一的中国记者。胡政之在作上述统计时也说：“吾国以纯粹新闻记者资格前来者，惟予一人。”其实，胡政之在这里强调的是，在采访和会的中国人中，只有他自己是一个真正的职业记者。李璜和周太玄的正式身份是学生，办通讯社是他们的副业。在胡政之眼里，他们当然不是“纯粹”的记者。实际上，胡政之和周太玄在巴黎有很密切的接触，并且一起探讨过对和会的报道。胡政之逝世后，周太玄在悼文中说：“和会在巴黎开会，先生代表《大公报》到了巴黎，那时我也正在办巴黎通信社与《旅欧周刊》。在巴黎见面，彼此非常欢幸，常常相约作竟日游。对于和会的新闻采访报道，更多不厌详尽的研究和启示。”^[5]

李璜和周太玄虽然不是职业记者，但在中国代表团王正廷的帮助下，也得到了进入凡尔赛宫采访的机会。上海《新闻报》还汇来电费，约请他们拍发电报。李璜说：

因上海《新闻报》要抢先发表巴黎和会重要消息，并来特约为通电讯，汇来预付的电费，

于是又逼得我非去凡尔赛宫亲自采访不可。幸得中国代表团的王正廷（他是南方军政府所指派来参加中国代表团，颇受北京政府代表排挤，故他愿意接触一班好事的学生）帮忙，为我在代表团弄得名记者名义，挂起徽章，我因得以中国记者身份随时进入凡尔赛宫，与各国记者鬼混，当然比只看报要印象来得深刻，且消息灵通一些。得着比较特殊点消息，便跑回来与太玄商量，用十字码电拍给上海《新闻报》，使该报在民八的四月半之后，销路为之大增。^[6]

到了4月中旬，中国代表团在山东问题上的交涉日趋困难，李璜和周太玄的采访报道活动也更加紧张起来。4月26日，李璜给左舜生写信说：“近日和议席上，正提胶州事，吾国使者不及日人有钱有势，故现象颇不佳。通讯社正在各处访新闻，要为胶州事出一号外，故弟甚忙，不能多写，望足下常常惠书为要。”^[7]其当时的忙碌程度，于此可见一斑。

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提出了取消列强在华特权、取消中日“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归还大战期间日本乘机夺去的德国在山东的各项权益等要求，但和会只将山东问题列入会议讨论。日本以中日之间曾订有密约为借口，要求和会同意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并得到英、法的支持。由于美、日在太平洋和远东地区的矛盾，美国起初表示支持中国的要求。后来日本以退出和会相要挟，美国为使和会免遭破产，最终对日妥协，放弃了对中国的支持。4月30日，英、美、法三国会议对山东问题做出最后裁决，同意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均让与日本，中国在山东问题上的交涉完全失败。周太玄回忆说：

当最为国内关心的青岛归还问题刚在和会中决定迁就美代表团的意见不归还我国时，巴黎通讯社已经得到消息，便连夜奔走筹款，超过英、美、日通讯社，第一个把这一消息电传到国内各报馆。^[8]

周太玄的回忆是否准确呢？巴黎和会是确立战后国际新秩序的重要会议，各国通讯社均极为重视，新闻的竞争非常激烈。据胡政之说，“和会里路透公司的记者最多，速记差不多五分钟换一次人，记好后便依次由该公司记者传出，当时就由自己装设之海底电报发出，其传达消息之迅速，实属惊人。”^[9]与路透公司这样的通讯社比起来，巴黎通讯社只是个小小的“新闻作坊”，它真的能够抢在各大通讯社之前，率先发出和会裁决山东问题的消息吗？

笔者认为，周太玄所述是可以采信。主要的根据是：巴黎和会实际上完全为英、法、美、意、日五大国所操纵，凡和会一切重大问题均先由五国会议讨论决定（意大利退出和会后，五国会议改为英、美、法三国会议），而各国代表全体参加的大会并不常开，且止于形式。“新闻记者惟能赴大会旁听，至平常五强会议及各分科委员会则概属秘密，但由当局者公示发表其议题与大要结果而已。”^[10]4月30日的三国会议对山东问题作出裁决，但秘而不宣，并没有将这一决定立即公布。因此，外国通讯社未必能够在第一时间获悉这一决定。而巴黎通讯社却捷足先登，在中国代表团那里得到了这个消息。据李璜回忆，是王正廷暗中告诉他的，他立即向国内发了电报。^[11]王正廷之所以把消息透露给李璜，则与他是广东军政府的代表有一定的关系。广东军政府与北京政府是敌对的，正可利用此次外交失败来打击北京政府。^①此外，还有一则史料可引为佐证。1920年3月出版的《东方杂志》有一篇关于组织国际通讯社的报道，在对巴黎通讯社的介绍中特别强调：“去年和会议决山东案时，首先拍电回国报告者即为该社。”^[12]

中国以战胜国的资格参加巴黎和会，却未能收回在大战中丧失的权益，反而成了列强分赃的对象，蒙受了战败国的耻辱。山东问题交涉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全国人民义愤填膺，北京学生举行示威游行，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巴黎通讯社还在相关报道中指出，皖系政府与日本签订的济顺、高徐铁路借款合同是招致中国外交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从而激起了人们对军阀政

① 1919年6月30日《申报》刊有周太玄5月5日发自巴黎的通讯，引述了王正廷对这次外交失败原因的分析，对北洋政府亲日派官员丧权辱国进行了谴责。

府的极大愤慨。^①孙洪伊在“请北洋诸将讨贼救亡电”中说：“巴黎通信社来电，谓胶州判归日本，系由段、徐辈与日本订立密约所致。又美总统慰问吾国专使，谓美国曾竭力援助中国，无如中国为新修约所束缚，遂无能为力云云。是知外交之得此恶果，固不在巴黎而在北京。”^[13]这份通电援引巴黎通信社的报道，将矛头直指签订中日密约的皖系政府。在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北京政府罢免了亲日派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职务，中国代表团也没有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李璜在回忆录中说，到了和约签字前一日，巴黎通信社和几位同学分头去会晤中国代表团代表顾维钧、施肇基、魏宸组、王正廷等，惟有首席代表陆征祥没有见面。虽然得到代表们答复不去参加签字典礼，但学生们仍惶恐受逼，遂前往陆征祥住处包围，以防陆氏私自潜往签署。当时他们的心情紧张与愤怒，也不亚于国内正在罢课、罢市的人们。^[14]

三、巴黎和会后的欧洲通讯

1919年6月在巴黎出版的《华工杂志》，对巴黎通信社有这样的介绍：“近有自国内来法之新闻记者数人，在此间组织一通信社，名巴黎通信社，专供给国内外华文报纸之欧洲新闻。闻已出至第七期。大约月出三期，每期约在万言左右。凡重要事件，皆为详叙本末。闻尚在筹备电社及法文通信部。”^[15]由此可知，巴黎通信社计划发展电讯，正在筹备“电社”；还要设立“法文通信部”，向法国报纸供稿。周太玄在6月间给曾琦写信说：“法文部由幼樵（李璜）编辑，已出稿一次。电社方有大规模之计划，但在未成立以前，每月至少亦有数电回国。”^[16]然而，这个有大规模计划的“电社”，却没有建立起来。巴黎和会在6月底结束，巴黎通信社失去了这个新闻热点，国内报馆不再汇来电费，拍发电报就难以为继了。

发展电讯的计划虽然没有实现，但巴黎通信社仍向国内报纸邮寄通讯，报道欧洲的新闻。1919年10月出版的《少年中国》杂志上，刊有巴黎通信社的广告，内称：“本通信社在巴黎出稿，专供给国内报纸欧洲新闻。内容计分：（一）撰述；（二）译述；（三）谭话；（四）调查；（五）杂录；（六）专件。均综合事实，详述始末。每月出稿三次，每次可供日报五日以上登载。”^[17]从当时国内报纸刊登的稿件来看，巴黎通信社编发的新闻主要是国人特别关注的一些欧洲事件和旅欧华人的各种动态。

由于巴黎和会打破了人们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幻想，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在五四运动后的中国思想界中，有相当一部分人逐渐怀疑资本主义制度而向往社会主义，出现了研究社会主义的热潮。在法国的李璜等人对社会主义也很有兴趣，并把介绍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作为巴黎通信社的一个报道重点。李璜后来说：“在欧战停了的时候，我那时在欧洲，看见欧洲各国政治家仍旧不改故态，你倾我诈，又在勾心斗角地制造着二次世界大战。我那时颇以为俄国列宁这个联合世界平民起来推翻现状的办法是最彻底的，是足以一改旧观的，因此我对于第三国际的主张比较很表同情。我那时同一位朋友周太玄君办了一个巴黎通信社，关于苏俄的政治和列宁的主张向国内介绍得特别多。”^[18]当时，帝国主义国家对苏俄实行严厉的封锁，西方通讯社对苏俄作了不少歪曲的报道，人们迫切要求了解这个新生社会主义国家的实际状况。巴黎通信社通过各种渠道广泛搜集信息，力求向人们提供苏俄的真实情况。如通讯稿《俄国波尔失委克之真相》，是巴黎通信社对从苏俄归来的瑞士人比鲁果夫所作的访谈。详细介绍了协约国对苏俄的封锁、莫斯科人民生活之写真、苏俄政府的税则、农民的状况、社会共同生活的新组织、并耕而食的模范社、苏俄的

^① 段祺瑞政府为实现“武力统一”，不惜出卖国家主权来换取日本的借款支持，于1918年9月24日同日本签订了济顺、高徐铁路借款两千万日元的合同。作为借款的代价，又同日本签订了“山东问题换文”，使日本进一步获得了中日合办胶济铁路的特权。此项换文，种下了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最大祸根。日本在和会上正是以此为据，坚持要求取得在山东的特权，美、英、法等列强也是以此为借口出卖中国的。

宗教政策、托洛斯基对经济政策的意见、苏俄的知识阶级、内政的设施、文艺革新、苏俄与托尔斯泰主义，等等。这些信息对于人们了解和研究俄国革命，无疑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巴黎通信社的另一个报道重点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早在1912年，李石曾和吴稚晖、蔡元培等在北京发起组织“留法俭学会”，鼓励人们以低廉的费用去法国留学，从而“输世界文明于国内”，以改良中国社会。1915年，李石曾、蔡元培、吴玉章等在巴黎组织了“勤工俭学会”，以“勤于工作，俭以求学”为宗旨，号召中国青年去法国半工半读，并成立“华法教育会”作为留法勤工俭学的工作机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内青年受新思潮之鼓舞，求知之心大盛，复耳濡口染于工读之名词，耸动于劳工神圣之思，奋起作海外勤工俭学之行者因以大增。”^[20]自1919年初到1920年底，共有近2000名学生赴法勤工俭学，为我国留学史上空前之盛举。巴黎通信社本身就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一个产物，成立时还得到了“华法教育会”的帮助，因此对这一运动特别予以关注。它在一篇通讯中说：

留法勤工俭学一事，自去年三月以来，国内青年起而实行者，已近千人。成绩既佳，则一般失学之士，只要能耐劳苦者，皆可出而吸收世界文化，各得一部分之成就，诚为补救救国中多数沉闷青年之唯一方法。故本社对于此事，实表无限同情，且时留心其实况，纪之以告国人。^[21]

巴黎通信社对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作了广泛的报道，内容包括勤工俭学生抵法人数、所入学校和工厂的人数、勤工俭学生工作和学习的详细情况、“华法教育会”对勤工俭学的看法与安排、法国人士对勤工俭学的态度、勤工俭学的成绩和所遇的困难等各方面的情况。这些报道，对于国内了解勤工俭学的动态、促进赴法热潮的持续起了重要的作用。

四、国际资讯网：一个没有实现的计划

据前文所引周太玄的回忆，少年中国学会原打算在东京、纽约和巴黎同时成立通讯社，因为人员及情势的演变，才决定把力量先投在巴黎。巴黎通信社因成功报道巴黎和会的消息而声名大噪，少年中国学会的主持人王光祈很受鼓舞。中国在和会上的外交失败，也使他对于国际宣传的重要性有了更加深切的认识。巴黎和会结束后，王光祈便开始筹划在其他国际都市创设通讯社。1919年6月，王光祈与清华学校仁友会联络，希望该会在美国办一个通讯社。他说：“现刻欧美人士对于中国情形，颇多隔阂之处，国内报馆虽多，然操纵新闻之权，仍握诸外人所办之通信社，危险实甚。现在巴黎方面已由敝会会员周太玄、李璜诸君创办通信社一所；东京方面去年敝会会员曾琦、易家钺诸君本办有华瀛通信社，因拒约归国，遂致停顿，现已拟设法恢复；南洋方面亦有筹办通信社之计划。惟美国方面敝会只有会员一人，一时甚难着手，故极希望贵会办理。”^[22]1920年春，王光祈决定赴美留学，目的之一就是要到美国创办通讯社。出国之前，王光祈向国内新闻界介绍了组织国际通讯社的计划。其发起理由为：

(一) 巴黎和会吾国外交失败之原因虽多，而其中尤以吾国民在国际间向来缺少新闻方面之活动为其重要原因之一。较之日本国民在国际间之活动，实踈乎其左。(二) 现在国际联盟会议将开，吾国民在国际间亟宜有所活动，务使消息灵通，以挽救以往之失败。(三) 除去欧美人士与中国国民之间之隔阂，务使其互相了解，常通正确之消息。(四) 关于世界学术界消息，传播极其迟缓，为吾国教育界之最大损失，亟宜设法使其迅速。(五) 海外华侨及留学生对于祖国之消息极不易得，国内对于侨胞亦复漠不相关，亟宜设法使其消息灵通。(六) 中国在国际间向无自办之通信社，一切新闻传播完全假手外人，实属异常危险，亟宜自起谋法，以图补救。(七) 世界大势既趋重国民外交，吾国民宜以真正之民意宣传国外，万不可依赖政府。(八) 在国外既有通信社之机关，便可藉此与外国各种团体联络，以为改造世界之地步。^[23]

该计划称，除已有的巴黎通信社外，要在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四地分别设立通信社。

“纽约通信社拟于本年（1920）八月创设，上海通信社与纽约通信社同时设立。”“东京、伦敦两通信社亦将筹备妥当，不久便可成立。其余国内国外各大埠，暂时遣设通信员。”如果这个计划得以实现，将会形成一个颇具规模的全球通讯网，由此可见王光祈等人当时的气魄之大。

然而，这个国际通讯网最终没有建立起来，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四处通信社后来都未见成立。少年中国学会在美、英、日都有会员，并不缺乏人力，但通讯社的经费却不容易解决。王光祈曾赴南洋筹款，为创办通讯社募集资金，但没有成功。1920年5月，全国报界联合会曾决议与海外留学生联合组织国际通讯社。^[24]令人遗憾的是，全国报界联合会不久即告解体，这个决议未能付诸实施。

巴黎通信社是何时停办的呢？周太玄说它“在进入1920年以后便无形停顿了”，^[25]这是不准确的，因为1920年下半年国内报纸上仍刊有巴黎通信社的稿件。在笔者所见史料中，最晚提到巴黎通信社的，是1921年6月30日周恩来从巴黎发给天津《益世报》的一篇通讯。这一年6月，北洋政府派专使到巴黎，同法国政府密商借款3亿法郎，用以购买军火，并以全国印花税、验契税和滇渝铁路的修筑权为抵押。消息传出后，旅法学生与侨胞群起反对。周恩来在通讯中说，巴黎通信社与华工会、中国留法学生联合会、国际和平促进会、亚东问题研究会、旅欧周刊社等6个华人团体成立“拒款委员会”，召开“拒款大会”，掀起了反对中法秘密借款的运动。^[26]这说明巴黎通信社在1921年6月仍然存在。也就在这一年的夏秋时节，李璜和周太玄到了法国南方，进入蒙彼利埃大学读书。他们离开巴黎后，通信社可能就停顿了。

巴黎通信社虽然只存在了两年多，但在海内外信息沟通上起了重要的作用。它以中国人的立场采访报道巴黎和会，最先将山东问题交涉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使国人及时作出反应，为维护国权而奋起抗争。它也是国内公众了解旅欧华人状况的一个信息渠道，促进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发展。左舜生曾评价道：“巴黎通信社稿件的内容，我觉得很好，每次能详细介绍旅欧华工和留法俭学的消息，实在有益于国人海外发展的事业不小。”^[27]我们在研究这一时期旅欧华人的社会活动时，巴黎通信社自然是不能忽视的。

【注释】

- [1] [6] [11] [14] 李璜：《学钝室回忆录》上卷，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41-42、42、42、43页。
- [2] [8] [25] 周太玄：《关于参加发起少年中国学会的回忆》，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一），三联书店，1979年，第545-546、546、547页。
- [3] “曾琦致周太玄、李璜”，《少年中国》1919年第1期。
- [4] [10] 胡政之：《平和会议之光景》，《大公报》1919年4月20日。
- [5] 周太玄：《悼念胡政之先生》，《大公报》1949年4月21日。
- [7] “李璜致左舜生”，《少年中国》1919年第1期。
- [9] 胡政之：《中国通信社》，《燕大周刊》1925年第86期。
- [12] [23] 《最近之公布事业》，《东方杂志》1920年第6期。
- [13] 《孙洪伊请北洋诸将讨贼救亡电》，《民国日报》1919年5月19日。

- [15] 《巴黎通信社出现》，《华工杂志》1919年第35期。
- [16] “周太玄致曾琦”，《少年中国》1919年第2期。
- [17] 《巴黎通信社广告》，《少年中国》1919年第4期。
- [18] 李璜：《国家主义与世界大势及中国问题》，《国家主义论文集》第2集，中华书局，1926年，第2页。
- [19] 《俄国波尔失委克之真相》，《东方杂志》1919年第11期。
- [20] 恩来：《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之大波瀾》，《益世报》1921年5月9日。
- [21] 《留法勤工俭学杂述》，《时事新报》1920年7月1日。
- [22] 《会务纪闻》，《少年中国》1919年第1期。
- [24]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三联书店，1955年，第255-256页。
- [26] 恩来：《旅法华人反对借款之运动》，《益世报》1921年8月17日。
- [27] “左舜生致少年中国学会”，《少年中国学会周年纪念册》，上海亚东图书馆，1920年，第64页。